

上海的“齿轮”

马尚龙

有一天,我灵感乍现,将外滩的海关大楼大钟一比。

记忆中,外滩大钟一直准时,是公众的时间“校准器”。五六十年前,每到外滩大钟报时,外滩不少行人,会停下脚步,撩起左手袖子,亮出手表,校对时间。这个习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机械手表走时“野豁豁”,每天都要对表;二是即便不准,手表也是奢侈品,在外滩撩起袖子对表,很拉风。外滩大钟就此有了更多的无形魅力。

海关大钟是光鲜的,体面的。体面常常不止是一种表面。运维支撑着海关大钟的光鲜和体面,是它内部的机芯。我看到过海关大钟的机芯,不似手表机芯的精巧,大钟的机芯,是一个齿轮组合,更像是一个机房。

从来没有怀疑过外滩大钟的准确度,但是很少人会想及所有的准确度是来自齿轮运维的准确。

在我的新书《上海秩序·深圳气质》中,我写到了外滩大钟和上海秩序的关系。都说上海人讲秩序,上海秩序可算是上海的个性化文化标签。上海非常光鲜和体面,但是光鲜和体面的背后,自有许多个类似海关大钟的齿轮组合。

不必说凡是是大钟都值得信赖。如今一些广场式的商厦,也有钟塔钟楼,还是四面都有钟面,落成时极其光鲜体面。几年之后,大多停了;更奇怪的是,四个钟面的长短针,停在了不同的时刻上,乱钟走到这个地步,也绝了。这时候没有人说钟面不好,而是说钟不好,是这些钟的齿轮出了毛病。

外滩海关大钟,配得上表里合一。这是上海秩序追求的表里合一。

秩序总有人在执行和维护的。我在上海秩序中,找到了三个层面三个群体,任何一个成功团队都少不了的三个群体:老领导、老法师、老实人。一说到这个话题,每个人眼前很自然飘过了自己遇到过的这三种人。

“三老”之名称似乎有欠严谨,更无法予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定义,但是正是不严谨的名称,很严谨地确立了三个群体的外延轮廓和内涵文化,还有三个群体在上海秩序中的角色分工。

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但是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三老”很像是三个互相咬合的齿轮。

三个齿轮有各自的大小、各自的转速、各自的转向。当三个齿轮互相咬合时,它们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也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更大更有效更持久的合力。更加奇妙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三者常常还是多项和兼容的身份,于是又生发出了其他的齿轮组合,以致扩展至上海的城市社会关系,三者的齿轮咬合无处不在。他们所形成的合力,是上海秩序中的重要板块。

我将自己的“发现”,带入到讲座中,很是受欢迎,不过也有遇到尴尬的时候。去包起帆工匠学院作讲座,台下竟有500人之多,且多是理工科中青年。讲到齿轮组合的咬合力,我有点心虚,怕有常识性错误。我只好先坦白,我的物理年轻时就不很好,现在一片空白,要是我表述错了,请大家纠正,以后就不会出洋相了。台下真有人举手了:马老师,齿轮组合产生的力,不叫咬合力,叫“啮合力”——是从啮齿类动物引申出来的物理概念。回到家里我查了查资料。不得了,啮合力有非常复杂的计算公式,我连符号都看不懂,但是我知道,它的计算结果正是齿轮组合产生的巨大能合力。



夜光杯

说来有缘,我的大半辈子会与仁济医院紧紧连在一起。

记得六岁那年,妈妈命悬一线在一家医院接受心脏大手术,其中主刀医生就是来自仁济医院的叶医生。妈妈痊愈后工作到退休,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感恩仁济的医生救了她的命。

1994年我大学毕业,坚定选择到仁济医院工作。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在医院教学办公室。工作后成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仁济医院首位医学教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担任过多年医学生的班主任,并参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申报成功国内第一家医科类网络继续教育院校,为在职医务人员进一步提升学历提供了可能。

在院领导的带领下,我参与编撰《仁济医院志》、创建院史馆、首次绘制医院文化地图、主办以医院医学史素材为主题的院史论坛。经过整整十八年的医学教育和新闻文化工作,仁济医院作为中国西医学教育发源地之一以及

发展的脉络,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仁济医院第二任院长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翻译《医书五种》(又名《西医五种》),标志西医理论正式输入近代中国,成为西医学东渐的里程碑。《医书五种》涵盖的五部著作,分别是《博物新编》(1849年)、《全体新论》(1851年)、《西医略论》(1857年)、《妇婴新说》(1857年)、《内科新说》(1858年)。此外,合信根据其译著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1858年出版),收录1829个英文医学术语词汇,是近代创立中文医学术语的首次尝试。

合信最初的编译工作是在广州开始的,来上海仁济医院任职后,他继续编译医学书籍,完成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介绍西医学基本理论的书籍之一《西医略论》(1857年)。最早的西医学妇产科和儿科学专著《妇婴新说》(1857年)、

医学教育源远流长

袁蕙芸

乃至东亚地区的西医学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医书五种》吸引了一大批中国青年学习西医。据复旦大学高骥教授研究,1888年7月,在仁济医院举行了一场“医学考试”,这场考试在今天看来相当普通。考试科目分为助产、临床医学操作、外科理论与实践、药物治疗学、创伤与急救等五项,考官共九位,来自美、英、德、法四个国家,考生仅三人。1888年8月1日,《申报》以“领宪志盛”为题



青青子衿 (纸本设色) 见君

“做土”的功效

俞可

“夜光杯之夜”,星光灿烂,照亮文学的夜空,而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最闪耀。

9月9日适逢新时代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且喜迎第40个教师节。“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3月2日含苞于左联会址纪念馆,9月9日绽放在徐家汇书院。而这两家机构,选址分别为中华艺术大学遗址与震旦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类思小学(今汇师小学)的旧址。文学与教育,与其说是一场不期而遇,不如说是一种如约而至。

“夜光杯之夜”的文学界嘉宾,拥有教师身份或经历者,不乏其人。“汇师”,则徐汇师范也。百科全书式文学评论家蒂博代1927年出版一本标题醒目的著作《教师共和国》。为学莫重于尊师,立国岂羞于重教。这幅景致该何等壮丽!仿佛赓续千年的中华尊师重教传统再现法兰西。

以法国大革命硕果之赫赫身世,1794年10月30日创建的巴黎高师开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先河,及至第三共和国方才跨入黄金时代,孕育两位总理班乐卫、赫里欧,以及与马克思、韦伯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的涂尔干,文学诺奖得主罗曼·罗兰、萨特。这个“高师人”群体,拯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普法战争之耻,造就法国通史所言之“美好年代”。

尤其1889年、1900年两届巴黎世博会与1900年、1924年两届巴黎奥运会,这座“光明之城”(指启蒙运动策源地)得以辉煌再现。今年巴黎奥运会便时时回溯那个时代。“高师人”所构筑的这座人文殿堂,坦然与比邻的先贤祠互为辉映而丝毫不逊。身为日内瓦大学法国文学讲席教授的蒂博代虽非“高师人”,但他终身感念高中教师柏格森。这位1927年文学诺奖得主亦拥有“高师人”身份,任教于巴黎亨利第四高中(马克龙总统的母校)。出自其门下的蒂博代可谓巴黎高师再传弟子。

倘若时空穿越,蒂博代现身“夜光杯之夜”,一番演讲势必惊四座。由1922年六次演讲集结而成的《批评生理学》,首个中译本便取名《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蒂博代的演讲并非面向受教育者,而鲁迅百年前的一次演讲,亦剑指文学批评,听众却为学生。他视当年批评家实为“不平家”,“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进而思绪万千:

“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此言岂非为“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的获奖者与

喝酒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明代大文人陈眉公说:“酒能乱性,佛家戒之。酒能养气,仙家饮之。余于无酒时学佛,有酒时学仙。”他不喝酒的理由很显然,就是在无酒的无奈之时,才不得已戒之。清代的大学者钱竹汀,可能也是受了前者启发,在这基础上撰写一副对联:“柔日读经刚日读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所谓“刚日柔日”,用我们今天的话简单说即“单日”也。其意概括下来就是:“书,无日不读;酒,有之则饮。”眉公和竹汀,两位皆是我们上海本地的前贤大咖,他们的话多少还是值得听听的。

当然,喝酒也是因人而异的,大凡可粗略分成四类:一类是自己虽有量,但天生不好饮,空有拔山力,不沾酒一滴。其次是既不好饮也无酒量,故凡遇敬酒,一概谢绝。因无量,而谢绝,这一类倒可称得上是“谢无量”了。第三类是虽好饮但酒欠量,这种朋友往往每饮必醉,三杯即倒。最后自然是好饮又能饮、有胆亦有量的厉害角色,在酒桌上,这类酒友基本是无往不利、见底收兵的。我的朋友史君差不多就属此类,某次他大病初愈尚未出院,人还在病床上就嚷着要喝酒了。医生正色告诫之:要喝可以,须自己签字画押。本想借此吓退他,不料史君高喝一声“拿来!”其豪气与景阳冈下小酒馆里武二郎的“拿来”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人喝酒,确实是需要豪气的。闻一多当年讲课时曾有一句名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真名士。”一听就知是一位豪气冲天、喝酒不用劝的名士。而今庸凡粗鄙如我辈,《离骚》从来也未读熟,名士肯定也做不了,不要说“真名士”,就是“假”的也难扮了,于是,剩下的就只能“痛饮酒”了。好在对“痛饮”一词倒有颇多体会,因为喝高了难免会磕磕碰碰,当时浑然不觉,唯翌日醒来,方才感觉到酒后之“痛”。

闻一多的酒量高下我不清楚,反正不会在第一第二类。据梁实秋回忆,他们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经常聚饮,还与校长杨振声和几位教授等凑齐了“酒中八仙”,唯一一名“女仙”即方令孺教授。“三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看到他们天天划拳豪饮,吓得连忙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甘做“谢无量”了。

其实胡适二十来岁时,也有过大醉

胡闹的经历。那时他在上海,教书之余常与一班朋友打牌厮混,连日喝酒,结果有一次大醉酩酊,踉跄而归,等他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在巡捕房里,身上连马褂和一只皮鞋也不知去向了……不过这一场醉成了胡适的人生转折,自此他幡然醒悟,随后辞去华童公学教职,北上发愤读书数月,终于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美生,开启了他迈向大师的第一步。

对于真正爱酒的人,很难说出不喝酒的理由。翻译家杨宪益是一位诗酒风流的名士,年轻时留学牛津大学,娶了金发碧眼的美女同学戴乃迭,漂亮极了。回国后虽历经坎坷,但恩爱终老一生。杨宪益爱诗亦爱酒,曾自嘲道:“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因为他专以打油诗闻名,有一首《谢酒辞》说:“休道舍命陪君子,莫言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君尽兴,从来大吏不糊涂。”尽管诗作成集,脍炙人口,但他却一直自谦:“我不会写诗,我只能吃酒。”他在《漏船载酒忆当年》一书中,就写了许多喝酒趣事。抗战时期的重庆时常停电,某个无灯无月的冬夜,诗人梁宗岱又到杨宪益处聊天,瞎聊岂能无酒,杨宪益记得自己床底下有一坛浸泡着龙眼的白酒,于是摸黑去床底取酒,结果却误将另一坛子煤油,当成白酒给梁宗岱倒上满满一碗。煤油色泽泛黄,正和浸泡的龙眼酒相近,梁宗岱尝了尝说,这个酒很有劲头,似乎有一种特殊味道,于是毫不犹豫地吧碗里的酒都干了。事后杨宪益才发现自己拿错了,很是担心,不过第二天遇上梁宗岱,看他啥事也没,于是道出原委,两人为此笑得前俯后仰。

《世说新语》里有位爱酒的刘公荣,他可以和各种人士干。有人讥他杂糅非类,不加选择,刘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者,又不可不与饮。”所以他没有理由拒绝任何来酒。此也再次印证,爱喝酒的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唯有不喝酒才需要各式各样的理由。上海人喝酒虽然从不硬劝,但出于真诚与热情,总还是希望客人畅饮尽兴。譬如你说开车,那我们帮您叫好代驾;酒精过敏,那就喝点无醇气泡酒;牙龈肿痛,那白酒正好杀菌解毒;脾胃不适,那啤酒可以通通气;晚上还有工作,那我们早喝早歇……在餐桌上,不喝酒的理由再多,同座总会想方设法为之解决。直到某次,一位朋友不喝酒的理由说是“备孕”,结果举座默然,一致放行,深知唯此无法“代劳也。”

不喝酒的理由

管继平



参与者量身定制?

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附中,应校友会之邀,鲁迅发表《未有天才之前》这篇演讲。虽针对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却泛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鲁迅此“料”极准,台

下聆听者有附中中学生钱学森。钱学森式的“天才大半是天赋的”,但“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且“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

鲁迅深得“做土的功三昧”。其1909年留日归国至1936年在沪早逝的27年壮伟人生,教育工作经历竟长达20余年,从中学教师、校长,到大学讲师、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直至教育部官员。教育乃其主业,文学则沦为副业。

手持“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的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旨的文学创作“做土”。文学与教育,均以“立人”为使命,即由造就拥有独立与自由精神之主体而实现“群之大觉”,彰“人国”之威。由是观之,作家与教师,一体两面。

作家与教师这类“泥土”,要是“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鲁迅坚信,“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就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滋养并孕育天才与人才的沃土广袤无比,“夜光杯”可谓95岁寿星《新民晚报》深耕的一抔泥土,堪作“坚苦卓绝者”,犹如鲁迅一生创办或主持的十余种期刊。由是畅想,倘若各行各业人士纷纷效仿作家及报人齐心“做土”,一个“教师共和国”方可“屹然独见于天下”。

十日谈

仁济的故事 责编:沈琦华